

# 吐鲁番文书总目

欧美收藏卷 荣新江 ● 主编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 吐鲁番文书总目


(欧美收藏卷)

荣新江 主编

杨富学 姚崇新 刘安志 毕 波  
文 欣 府宪展 刘景云 党宝海  
陈怀宇 孙英刚 王媛媛 余 欣  
裴成国 朱立峰 李丹婕 陈 昊

编 纂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吐鲁番文书总目·欧美收藏卷/荣新江主编.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7. 9

ISBN 978-7-307-05614-5

I. 吐… II. 荣… III. 出土文物—文书—吐鲁番地区—目录  
IV. K877. 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69622 号

责任编辑:张俊超 责任校对:王建 版式:支笛

---

出版发行: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wdp4@whu.edu.cn 网址:www.wdp.com.cn)

印刷: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64.125 字数:1547千字 插页:3

版次:2007年9月第1版 2007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7-05614-5/K·336 定价:148.00元

---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凡购买我社的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 《吐鲁番文书总目》编撰小组成员名单

- 陈国灿 (武汉大学 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  
朱 雷 (武汉大学 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  
荣新江 (北京大学 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冻国栋 (武汉大学 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  
杨富学 (敦煌研究院 民族宗教文化研究所)  
刘安志 (武汉大学 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

## 鸣 谢

本书先后列入以下科研项目并获得相关项目基金的资助，谨此致谢：

武汉大学国家社会科学“八五”规划重点项目  
“海内外吐鲁番文书的整理与研究”  
(1992—2002年)

兰州大学“985”工程敦煌学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资助项目  
“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  
(2002—2008年)

北京大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新出土及海内外散藏吐鲁番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2005—2008年)

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资助出版项目

## 总 前 言

坐落在天山东部博格达山脚下的吐鲁番盆地，在秦汉以前，曾是姑（车）师人生活定居的地方。随着西汉王朝对西域的经营，汉元帝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中央朝廷便在此建置了“戊己校尉”，进行军事屯田。经历魏晋，至前凉建兴十五年，即东晋咸和二年（公元327年），张骏于此地置高昌郡。此后，高昌先后曾为前秦、后凉、西凉、北凉等割据政权的属郡。在沮渠氏北凉流亡政权统治高昌期间，车师前王国最终被灭，吐鲁番盆地统一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沮渠氏之后，盆地进入高昌王国时期，先后经历了阚、张、马、麹四姓王国的统治。直到唐太宗贞观十四年（640年），麹氏高昌王国才被唐所灭，唐于其地置西州，并在当地全面推行中原制度，使之成为唐朝经营西域的重要基地。9世纪初，回鹘人进驻西州，由此开始了西州回鹘王国的时代。13世纪初，此地又归属于元王朝的统治。公元1756年，清朝以维吾尔族大阿訇额敏和卓世领其地。

历史上的吐鲁番盆地正当丝绸北路，又是中西交通的重要枢纽。两千多年来，先后在此生活定居过的民族有车师人、汉人、粟特人、突厥人、吐谷浑人、回鹘人等。因此，这里有着较为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加之，此地气候干燥，高温少雨，故在其地上地下，遗留下来了大量的文字记录，特别是古代的纸质文书。这些文书既有汉文的，又有其他民族文字的。其最早者，可上溯至公元3世纪；晚者延续至清代。它记录着古代先民们的各种活动和思维，也记载了历代官府在这里的施政政策及其行政运转；它既积淀下了一千多年来丰厚的中华古代文明，也渗透着不少外来的文化，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宝贵历史文化遗产。

吐鲁番文书主要出自古墓葬、古城遗址、佛教石窟等处。出自墓葬的文书，除少量较为完整外，大多是被制成葬具而埋入的，如纸靴、纸鞋、纸冠、纸带、纸俑、纸衾、纸棺等，因而较为残破；此外，其他的文书也多是倒塌的佛寺、石窟寺或古城遗址中发掘出来，同样也残缺不全。这与出自莫高窟藏经洞的敦煌文书有很大的不同。

前清末叶，一些雅好古物的新疆地方官员，常从吐鲁番地区的农民手中，获得一些古代的写本，题跋赏玩。与此同时，一些外国的探险家、考察队也纷至沓来。1898—1910年间，俄国的考察队先后三次到吐鲁番搜寻古物和古代写本；1902—1914年，德国组成的“普鲁士皇家吐鲁番考察队”先后四次对吐鲁番的佛寺、洞窟、古城遗址进行了搜寻和发掘；1903—1913年，日本的大谷探险队也曾三次到吐鲁番各遗址搜寻古物，还对阿斯塔那古墓葬进行了首次大规模的发掘，获取文物与古文书不少；接着英国的斯坦因1915年到吐鲁番，除对古城、佛窟搜寻外，也发掘了阿斯塔那古墓葬，又获取了不少墓葬文书。一时间，吐鲁番出土的古文书，与敦煌藏经洞出的古写本一样，成了人们谋求收藏的珍品，于是一些中外冒险家、猎奇者们，也零星不断地到吐鲁番来进行挖掘和收购。如此一来，吐鲁番出土古代文书流向世界各地的历程，竟长达半个世纪。然而，中国的考

古工作者在此地也做了卓有成效的发掘。1928年和1930年考古学家黄文弼两次来到吐鲁番盆地进行考察，从当地购得各遗址出土文书若干件。1959—1975年，新疆文物考古工作者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和哈拉和卓古代墓葬先后进行了13次的系统发掘，获得一大批文书和文物。1975年以后，吐鲁番地区文博部门又在阿斯塔那古墓葬、柏孜克里克千佛洞等地陆续进行了抢救性的发掘和清理，也获得了不少文书。

因此，在日本、德国、英国、俄国、芬兰、瑞典、土耳其、美国、印度等国的一些博物馆、图书馆和研究部门，都有吐鲁番文书的收藏。而在中国国内的许多博物馆、图书馆甚至档案馆也有一些收藏。究竟吐鲁番出土的古写本、印本文书总的数量有多少？具有哪些内容？长时期以来，中、外学术界也都并不十分清楚。而造成目前吐鲁番学层层迷雾的原因，尽管有多种，但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各国对这些文书的编目、刊布和研究发展不平衡。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由于国家重视，在国家文物局直接领导下，成立了以唐长孺教授为首的“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小组”，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出土的吐鲁番文书，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并于80年代由文物出版社完成了《吐鲁番出土文书》的出版。日本龙谷大学大宫图书馆所藏的大谷文书，在小田义久教授主持下，从80年代起，整理出版了《大谷文书集成》，到目前已出版3卷。与此同时，羽田明、山田信夫等对吐鲁番所出回鹘文文书的整理；百济康义等对伊朗文书的整理；武内绍人和上山大峻等对古藏文文献的整理也相继发表出版。可以说到20世纪末期，中国和日本对吐鲁番文书的整理和研究，已走在国际吐鲁番学领域的前列。两国学者，不仅关注本国所藏，而且关注着他国他地的收藏或整理，并出了不少新成果。这为我们编纂海内外所藏吐鲁番文书总目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然而，也还有不少收藏吐鲁番古写本的国家，至今未对其所藏做出全面整理和编目，如德国当年“普鲁士皇家吐鲁番考察队”携往柏林的吐鲁番古写本，除了日本学者协助编过两本佛经目录外，迄今未见一个全面完整的收藏目录。俄国探险队多次将在吐鲁番所获的古写本带至圣彼得堡后，与敦煌文书混在一起，统称为“敦煌特藏”，尽管后来孟列夫编有两本解说目录，也只做到2925号。而现在上海古籍出版社与俄国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俄罗斯科学出版社东方文学部联合出版的《俄藏敦煌文献》，已刊布到19080号。其中有哪些属吐鲁番出土物，均有待甄别。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图书馆藏有约2000号来自中国新疆、甘肃出土的古写本，其中有不少出自吐鲁番，也存在有待甄别的问题。类似的情况，在一些收藏量不是很大的国家里也存在着。这些无疑增加了编目工作的难度。

本目录的编制工作开始于1992年，并作为“海内外吐鲁番文书的整理与研究”的子项目，列入国家“八五规划社会科学重点项目”。十多年来，项目组成员围绕着本课题都分别做出了不少成果，但总目却迟迟未能付梓，一是由于上述世界各地的收藏，需要做认真的实际情况调查，这需要时间，有时还需要等待，有些文书个案，还需作甄别研究；二是本总目属索引式的目录，对每件文书尽可能做到定名、断代、标明收藏地、号、行数、缺损以及简要说明等。此外还标示刊载该文书的图、文书刊以及围绕该文书的相关研究。这无疑会增加不少难度和工作量，特别是许多佛经残片及民族文字文书等的订名，花去了相当多的时间。

本总目由于分量较大，故分三册出版。第一册为中国收藏卷，第二册为日本收藏卷，第

三册为欧美国家收藏卷，由本项目组成员分工编撰。全三册，由陈国灿负责统一协调、定稿。虽然有此分工，但项目组成员所做的工作，有些又贯穿于全三册之中，如杨富学负责编制的回鹘文文书目录，又成了各册中回鹘文文书目录的组成部分，因此本总目又是全体项目组成员集体劳动、通力合作的结果。在本目录编制过程中，由香港敦煌吐鲁番研究中心饶宗颐先生组织、主编，由王素编著的《吐鲁番出土高昌文献编年》、陈国灿编著的《吐鲁番出土唐代文献编年》，相继在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这两部编年，对许多文书的订题、断代，提供了基础，对编制本目录的体例，也提供了借鉴，可以说本总目又是海内外吐鲁番学界此前劳动成果的一个总汇，因为本总目有些也是在利用他们已编目录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在此，我们对海内外吐鲁番学界的朋友们表示由衷的感谢。

编制一份海内外吐鲁番文书总目，意在为学术界提供一种便利，同时也为这份人类的历史文化遗产，列出一个比较明细的账目。然而，十多年来的辛勤劳作，做得也并非十全十美，情况不明者仍然不少，甚或存在着一些错漏。我们衷心希望，本总目的出版能促进海内外各收藏馆、所对本总目的内容进行丰富和补充，纠正其中的错漏，或者促成该单位及时编出所藏的详细新目录来，以推动总目事业的发展。

武汉大学出版社积极承担了《吐鲁番文书总目》的出版，并得到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基金的资助，我们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吐鲁番文书总目》编撰小组

2004年10月30日



## 欧美收藏卷前言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域考古的黄金时代，欧美一些国家的探险队捷足先登，在塔里木盆地周边和吐鲁番地区，获得了大量的古代写本、绘画、雕像等各种文物资料，充实到各个国家的博物馆和图书馆中，其中就有数以万计的吐鲁番出土的写本、刻本、壁画榜题等文献材料。

古代的吐鲁番盆地，位于丝绸之路的要冲，除了不同历史时期在此居住的车师、吐火罗、汉、突厥、回鹘（维吾尔）、蒙古等民族外，还有由于商贸、传教、征战、旅行等不同原因而暂居此地的大夏、印度、粟特、波斯、叙利亚、藏、西夏等民族，他们所使用的语言文字材料，多多少少地都在吐鲁番盆地留下了痕迹。在各国的考古发现中，我们目前所知有汉文、突厥文（Turkic）、回鹘文（Uighur）、吐火罗文（Tocharian）、梵文（Sanskrit）、大夏文（Bactrian）、粟特文（Sogdian）、中古波斯文（Middle Persian）、帕提亚文（Parthian）、古藏文（Old Tibetan）、叙利亚文（Syriac）、西夏文、蒙古文等语言文字书写的文献，从内容上看，既有儒家经典、佛教、道教、摩尼教、景教等典籍类写本、刻本，也有各式各样的公私文书，它们不仅仅是吐鲁番地区的产物，也有来自东西方遥远地域的输入品。从时间上来看，从公元3世纪到19世纪末叶，比较集中在高昌郡（327~449）、高昌国（450~640）、唐西州（640~803?）和高昌回鹘（9世纪下半~13世纪初）等不同政权的兴盛时期。从物质形态上来看，吐鲁番文书大多数来自沙埋遗址和古代墓葬中，多已不是文书的原始状态，不少是被二次利用的废纸，与藏经洞封存的敦煌文书相比，要残破得多。

面对着这些数量如此庞大、语言文字如此多样、时空跨度如此广远、题材内容如此多样的残篇断简，我们要编制一个“总目”，的确是有点不自量力。然而，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本着“六经皆史”、“四库皆史”的精神，吐鲁番出土的任何一个纸片，都是我们不能忽略的史料，吐鲁番出土的任何一件文物，都是丝绸之路上的文化结晶。因此，虽然我们明知道编纂“吐鲁番文书总目”的难度，但仍然勇往直前。反观敦煌文书的编目工作，虽然1962年王重民先生就主持编纂了《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但其实那也不能说是一个“总目”。所以，我们的“总目”可以说是一个奋斗目标，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有许多欧美收藏的吐鲁番文书没有公布，我们无从编起；还有不少民族语言的文献没有人能够解读，我们也无法释读编目。不过，由于吐鲁番文书的总目迄今尚无人做，因此把这些文书目录汇在一起，既可以给我们一个吐鲁番文书的总体认识，也可以帮助学者们将收藏在各地的文书联系起来，我们花费大量时间、精力所给出的每一件文书的前人研究索引（注到页码），也会节省学者们的宝贵时间。

《吐鲁番文书总目（欧美收藏卷）》的工作从1992年开始进行，断断续续竟然用了14年的时间。目前完成的这一卷，主要收录德国国家图书馆、德国印度艺术博物馆、英国图

书馆、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大学图书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图书馆等收藏单位的汉文、回鹘文、藏文、蒙文为主的文书，其中以德国的收藏最为丰富。至于德国、俄罗斯藏品中的摩尼文、粟特文、叙利亚文、梵文、吐火罗文文书，由于没有系统地公布原件照片，我们虽然已经编纂了相当的篇幅，但考虑再三，暂时没有收入此卷，以待来日条件更加成熟时完稿。目前这一卷目录是按收藏单位的编号排序的，因此混在这些编号中的粟特文、梵文等单篇文书，则同时收入，成组的文书，则不阑入。应当特别声明的是，除了汉文文献外，许多编号并非包括该编号的全部文书，如德藏 Ch/U、U 等编号中的回鹘文文书，因为我们的目录是依据前人的研究成果给出名称，那些还没有人研究过的胡语文书，我们不强作解人。即使是我们可以看懂的汉文文书，如德藏 Ch 编号中的许多佛典残片，迄今没有全部公布照片，而我们也没有长时间停驻柏林的机会，所以无法做进一步的比定工作，只能就前人发表的资料和我本人 1996 年逗留柏林时比定的部分结果来编目。其他馆藏资料的处理情况与此类同，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敬请读者谅解。

以下简要介绍各个馆藏吐鲁番文书的来历和编目情况，以便读者使用本目录时对于编号、收藏号以及目录的依据有所了解。

### 1. 德国国家图书馆 (Staatsbibliothek Preussischer Kulturbesitz) 与印度艺术博物馆 (Museum für Indische Kunst, SMPK)

德国国家图书馆和印度艺术博物馆是世界上收藏吐鲁番出土文献最多的机构之一，其来源是 20 世纪初由格伦威德尔 (A. Grünwedel 1856 ~ 1935) 和勒柯克 (A. von Le Coq 1860 ~ 1930) 率领的德国四次吐鲁番考察队的收集品。

1902 年 8 月，由柏林民俗学博物馆 (Museum für Völkerkunde) 格伦威德尔和胡特 (G. Huth 1867 ~ 1906)、巴图斯 (Th. Bartus) 三人组成的第一次吐鲁番考察队从柏林出发，经俄属突厥斯坦，于 11 月底到达吐鲁番盆地。从 1902 年 12 月初到 1903 年 4 月初，考察队在高昌故城 (Khocho)、胜金口 (Sengim)、木头沟 (Murtuk) 等地进行发掘，共获得 44 箱古物，包括写本、刻本、壁画、雕像等，写本中有梵文、突厥文、回鹘文、汉文、藏文、蒙文文献。1906 年，格伦威德尔出版了这次考察的报告——《1902-1903 年亦都护城及周边地区的考古工作报告》<sup>①</sup>。

考察队的收集品震惊了德国东方学界，在“中亚与远东历史、考古、语言、民俗考察国际协会”德国分会负责人皮歇尔 (R. Pischel 1849 ~ 1908) 和吕德斯 (H. Lüders 1869 ~ 1943) 的建议下，在德国皇室和教育文化部的赞助下，第二次吐鲁番考察队迅速组成。由于格伦威德尔健康不佳，民俗学博物馆的勒柯克被委任为考察队队长。勒柯克和巴图斯一起于 1904 年 11 月到达吐鲁番，继续发掘高昌故城，而后前往胜金口、柏孜克里克 (Bezeklik)、木头沟、吐峪沟 (Toyok) 等地考察，用切割的方法剥取了大量的石窟壁画。1905 年 8 月，勒柯克一行又往哈密，但收获甚微。当接到柏林方面让他们前往喀什与格伦威德尔会合的电报后，即启程西行。关于此次考察，1909 年勒柯克用英文写有《普鲁

<sup>①</sup> A. Grünwedel, *Bericht über archäologische Arbeiten in Idiku-tschari und Umgebung im Winter 1902-1903*, München 1906.

士皇家第一次（即德国第二次）新疆吐鲁番考察队的缘起、行程和收获》一文<sup>①</sup>。1913年，他编印了大型图录《高昌——普鲁士王国第一次吐鲁番考察重大发现品图录》，刊布了柏孜克里克石窟的壁画和高昌出土摩尼教壁画、绢画等<sup>②</sup>。另外，1926年，勒柯克还出版了第二、第三两次考察的个人旅行记《新疆古希腊化遗迹考察记——德国第二、三次吐鲁番考察报告》<sup>③</sup>，此书英译本《新疆地下埋藏的宝藏》流传很广<sup>④</sup>。

1905年12月，当格伦威德尔到达喀什后，即与勒柯克一起东行，开始了第三次吐鲁番考察队的活动。他们在图木舒克（Tumshuk）做了短暂逗留后，即往库车西面的库木吐拉（Kumtura）和克孜尔（Kizil）石窟考察，剥取壁画，并获得大批梵文、吐火罗文、回鹘文等文献材料。1906年5月，考察队继续东行到焉耆附近的硕尔楚克（Šorchuk），同样割取了大批佛教壁画和雕像。而后，勒柯克由于身体不适先期回国，考察队由格伦威德尔率领继续东行到吐鲁番，在高昌故城和哈密一带，一直工作到1907年4月止。此行时间较上两次吐鲁番考察为长，而且范围也超出吐鲁番，扩大到几乎塔里木盆地北沿的全线。回国后，格伦威德尔分别在1912年和1920年整理出版了两部正式的考古报告：《新疆古代佛教圣地——1906-1907年在库车、焉耆和吐鲁番绿洲的考古工作》<sup>⑤</sup>和《古代龟兹》<sup>⑥</sup>。

1913年5月末，勒柯克和巴图斯不顾德国外交部的警告，离开柏林奔赴喀什，进行第四次考察。此行的主要目的地是库车，他们除了剥取第三次考察时所访问过的石窟的壁画外，还调查发掘了阿及里克（Achik-ilek）、苏巴什（Subashi）、克日西（Kirish）、森木塞姆（Simsim）等古代佛寺或石窟寺。然后东行发掘库木吐拉。11月，西返图木舒克，一直工作到1914年1月中旬。此行的收集品装满了40大箱，运回柏林。勒柯克的报告书是1928年出版的《新疆的土地和人民——德国第四次吐鲁番考察队探险报告》<sup>⑦</sup>。

应当说明的是，德国的四次“吐鲁番考察”，实际上后两次的重点在库车，最后一次根本就没有到吐鲁番。但他们在库车、图木舒克、焉耆等地发掘的材料，一般习惯上也称之为“吐鲁番收集品”，这容易使人误解一些文物的原出土地。特别是现在许多写本的原编号已经佚失，我们很难判断它们来自吐鲁番还是其他什么地方，在没有其他旁证的情况下，我们至少不应当把它们统统归之为吐鲁番的发现品。在本卷中，因为按编号连续编

① A. von Le Coq, "A short account of the origin, journey, and results of the first Royal Prussian (Second German) expedition to Turfan in Chinese Turkistan", *JRAS*, 1909, pp. 299-322.

② A. von Le Coq, *Chotscho: Facsimile-Wiedergaben der wichtigeren Funde der ersten königlich preussischen Expedition nach Turfan in Ost-Turkistan*, Berlin 1913.

③ A. von Le Coq, *Auf Hellas Spuren in Ostturkistan: Berichte und Abenteuer der II. und III. deutschen Turfan Expeditionem*, Leipzig 1926.

④ A. von Le Coq, *Buried Treasures of Chinese Turkestan: An account of the activities and adventures of the second and third German Turfan expeditions*, tr. by A. Barwell, London 1928. 郑宝善中译本《新疆之文化宝库》，南京蒙藏委员会，1934年；陈海涛中译本《新疆的地下文化宝藏》，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

⑤ A. Grünwedel, *Alt buddhistische Kultstätten in Chinesisch-Turkistan, Bericht über Archäologische Arbeiten von 1906 bis 1907 Kuča, Qarasahr und in der Oase Turfan*, Berlin 1912.

⑥ A. Grünwedel, *Alt-Kutscha: archäologische und religionsgeschichtliche Forschungen an Tempera-Gemälden aus buddhistischen Höhlen der ersten Acht Jahrhunderte nach Christi Geburt*, Berlin 1920.

⑦ A. von Le Coq, *Von Land und Leuten in Ostturkistan: Berichte und Abenteuer der 4. deutschen Turfanexpedition*, Leipzig 1928.

排，一些明显知道是非吐鲁番的收集品也包括在内，并在解题中说明出土地；而那些没有原始编号的文书，则只能从内容上加以判断了。

四次吐鲁番考察队所获资料最初入藏于柏林民俗学博物馆，大概在人藏时给每件材料都编过号码。这种旧编号以 T 开头，指吐鲁番考察队所得资料；然后空格接写罗马数字 I, II, III, IV, 表明是第一、二、三、四次考察所得；后再空格写出土地的缩写词，主要有 B = 布拉依克 (Bulayiq) 葡萄沟废寺, D = 高昌故城, K = 高昌故城 K 寺遗址, K = 库车地区 (均为第四次探险所得, 前面作 T IV), Kurutka = 库鲁塔格遗址, M = 木头沟石窟, S = 胜金口, Š = 硕尔楚克, T = 吐峪沟, TB = 吐鲁番山 (?), TV = 吐鲁番山前坡地, x = 出土地不详, Y = 雅尔湖 (交河古城), α = 高昌故城 α 寺址; μ = 高昌故城 μ 遗址。遗址缩写后空格写数字编号。此外, 还有一些编号是整理者所加, 如 TM 表示突厥语摩尼教文献。

这些文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分藏在各地, 二战后分别归民主德国、联邦德国所有。东德所藏均入藏于东德科学院历史与考古中央研究所 (Zentralinstitut für Alte Geschichte und Archäologie), 并按文种重新编号, 即 Ch = 汉文文书, CH/U = 汉文和回鹘文分别在正面背面或混写在一面的文书, M = 摩尼文文书, MongHT = 蒙文文书, So = 粟特文文书, Ch/So = 汉文和粟特文在正面背面或混写在一面的文书, 编号顺序与 So 相同, Syr = 叙利亚文文书, Tib = 古藏文文书, Tu = 吐鲁番发现的古藏文文书, U = 回鹘文文书, 等等。西德所藏的一批文献材料, 于 1947 年转移到美因茨 (Mainz) 科学院收藏, 编为 Mainz 号, 后归入德国国家图书馆东方部, 编号未变。藏在各处的文物资料则归印度艺术博物馆收藏, 编号为 MIK III 接数字, 其中也有部分文书, 或者是写在绘画正面背面的文字资料。两德统一后, 凡文献类材料一律归德国国家图书馆收藏, 文物材料归印度艺术博物馆收藏, 部分从莱比锡博物馆移交的文书则两属, 即 Ch/U 8000 - 8182 号, 同时也编作 MIK III 028417 - 031776 号。

德藏吐鲁番文献数量巨大, 内容丰富, 自从它们被带回柏林之日起, 就有各行专家分别加以整理, 迄今未曾中断。已经发表的成果, 有论文, 有专著, 有丛刊, 也有目录, 虽然它们都是我们编目的依据, 但这里不可能一一罗列出来, 所以仅提示与编目直接相关的目录类成果。

#### (1) 汉文文书

汉文文书原本主要收藏于东德科学院, 自 1967 年开始, 民主德国学者在日本学者的帮助下, 编制了两本目录, 即施密特 (G. Schmitt) 与梯娄 (Th. Thilo) 主编的《汉文佛教文献残卷目录》第一卷和梯娄主编的第二卷, 著录了两千多号的佛典断片, 按《大正藏》的顺序排列<sup>①</sup>。两德统一后, 德国方面因无研究吐鲁番汉文佛典的人才, 佛典的编目工作主要由日本龙谷大学的百济康义教授 (1945 ~ 2004) 负责, 多年来, 他一直从事这些非常破碎的佛教文献的编目工作,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曾把二战后收藏在美因茨、现归德国国家图书馆的佛典残片编了一个简要目录, 即《美因茨资料目录——原西柏林所

<sup>①</sup> G. Schmitt & Th. Thilo, *Katalog chinesischer buddhistischer Textfragmente I*, in Zusammenarbeit mit Taijun Inokuchi; mit einem Anhang von Akira Fujieda und Th. Thilo (BTT VI), Berlin 1975; Th. Thilo, *Katalog chinesischer buddhistischer Textfragmente II* (BTT XIV), Berlin 1985.

藏中亚出土汉文佛典资料》<sup>①</sup>。百济康义生前编有一本《柏林所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总目》(试行本)<sup>②</sup>,是一份简要的对照目录,但其中给出了不少过去没有比定过的佛典的《大正藏》编号和位置,这无疑近年来电子佛典对于吐鲁番佛典残片编目工作帮助的结果。2005年,柏林出版了百济康义编《柏林藏吐鲁番收集品中的汉文佛教文献》第3卷<sup>③</sup>,这是上述《柏林吐鲁番文献丛刊》中《汉文佛典残片目录》第1~2卷的延续,主要著录《汉文佛典残片目录》第1~2卷中未比定的德藏吐鲁番文献 Ch 和 Ch/U 编号的佛典,虽然还没有把这两个编号的佛典残片全部比定;但已经相当可观了。我们希望日本和德国方面能够把百济先生的其他遗稿尽早出版。

至于德藏吐鲁番文献中的非佛典文献的编目工作,早年梯娄先生做过一些户籍、摩尼教文献残片的研究。两德统一后,德国方面委托给京都大学的西胁常记先生整理,他从1995年开始陆续发表一些相关的研究文章,2002年出版了所编的目录《柏林吐鲁番收集品中的汉文文献》<sup>④</sup>。

1996年6~8月间,我在柏林德国国家图书馆、印度艺术博物馆、柏林科学院吐鲁番研究所,系统翻阅了德藏吐鲁番文献,并陆续就其中笔者所关心的典籍和文书做过一些探讨,1998年在《德国“吐鲁番收集品”中的汉文典籍与文书》一文中,给出了非佛典文献的草目<sup>⑤</sup>。

本目录的德藏吐鲁番汉文文书部分,佛典主要依据《汉文佛典残片目录》第1~2卷、百济康义编《柏林所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总目》(试行本)、《美因茨资料目录》、《柏林藏吐鲁番收集品中的汉文佛教文献》第3卷,非佛教文献则参考前人陆续发表的论文和笔者的调查编目以及西胁常记《柏林吐鲁番收集品中的汉文文献》。

## (2) 回鹘文文书

德藏回鹘文文书是德藏吐鲁番文书的另一大宗。早在这些写本带回到柏林后不久,勒柯克就开始了突厥和回鹘文献的整理工作,他发表了三辑《高昌突厥语摩尼教文献集》<sup>⑥</sup>。自1908年至1931年,缪勒(F. W. K. Müller 1863-1930)共发表四篇题为《回

① 《マインツ资料目录——旧西ベルリン所藏中央アジア出土汉文佛典资料》,《龙谷纪要》第21卷第1号,1999年,1-23页。

② 《ベルリン所藏东トルキスタン出土汉文文献总目》(试行本),龙谷大学佛教文化研究所西域研究会,2000年。

③ K. Kudara, *Chinese Buddhist Texts from the Berlin Turfan Collections*, vol. 3, edited by Toshitaka Haseike and Mazumi Mitani, Stuttgart: Franz Steiner Verlag, 2005.

④ T. Nishiwaki, *Chinesische Texte vermischten Inhalts aus der Berliner Turfansammlung (Chinesische und manjurische Handschriften und seltene Drücke Teil 3)*, Stuttgart: Franz Steiner Verlag, 2001. 关于此目,参看 T. Thilo 的书评,载 *Orientalistische Literaturzeitung* 97. 3, 2002, pp. 424-426.

⑤ 饶宗颐编《华学》第3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8年,309-325页。

⑥ A. von Le Coq, "Türkische Manichäica aus Chotscho, I, II, III", *APAW*, 1911-6, 61pp. + 4pls.; 1919-3, 15pp. + 2pls.; 1922-2, 49pp. + 3pls.

鹞语文献》的长文（第四篇是葛玛丽/A. von Gabain 编成的），转写翻译了一些佛典残卷<sup>①</sup>。此后，由邦格（W. Bang 1869-1934）、葛玛丽先后主持，编辑出版《吐鲁番突厥语文献》，总共出版了 10 辑，发表了有关中原汉族传统的占卜书、摩尼教文书和赞美诗、忏悔文、佛典注疏和密教文献、《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占卜类文献、婆罗迷文拼写的回鹘文写本、吐火罗语 B 和突厥语译本摩尼教赞美诗、回鹘文佛教譬喻故事等<sup>②</sup>。葛玛丽还刊布了回鹘文《弥勒会见记》<sup>③</sup>，可惜这部书我们编目时未能找到。

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德国出版了两套和吐鲁番文献整理有关的丛刊，一是原民主德国科学院出版的《柏林藏吐鲁番文献丛刊》（BTT = Berliner Turfantexte），其中就包含有不少对回鹘文献的刊布，如哈札伊（G. Hazai）与茨默（P. Zieme）合著《〈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回鹘文译本残卷》<sup>④</sup>，吕尔伯恩（K. Röhrborn）《回鹘文本〈慈悲道场忏法〉》<sup>⑤</sup>，特赞（S. Tezcan）《回鹘文赞经》<sup>⑥</sup>，茨默《突厥文摩尼教文献》<sup>⑦</sup>，卡拉（G. Kara）与茨默合著《密教文献的回鹘文译本残卷》<sup>⑧</sup>，《回鹘文译萨迦班智达玄道和佛说圣妙吉祥真实名经》<sup>⑨</sup>，特肯（S. Tekin）《弥勒会见记：一部佛教毗婆沙论经典的回鹘文译本》<sup>⑩</sup>，茨默《回鹘文佛教头韵诗》<sup>⑪</sup>、《回鹘文金光明经》<sup>⑫</sup>、《回鹘文维摩诘所说

① F. W. K. Müller, "Uigurica. I. 1. Die Anbetung der Magier, ein christliches Bruchstück. 2. Die Reste des buddhistischen Goldglanz-Sūtra. Ein vorläufiger Bericht", *APAW*, 1908, Nr. 2, pp. 36-45; "Uigurica II", *APAW*, Nr. 3, pp. 1-109; "Uigurica. III. Uigurische Avadāna-Bruchstücke (I-VIII)", *APAW*, 1922, Nr. 2; F. W. K. Müller & A. von Gabain, "Uigurica IV", *SPAW*, 1931, pp. 675-727.

② W. Bang & A. von Gabain, "Türkische Turfan-Texte I-V", *SPAW*, 1929-1931; W. Bang, A. von Gabain & G. R. Rachmati, "Türkische Turfan-Texte VI, Das buddhistische Sūtra Säkiz Yükmäk", *SPAW*, Nr. 10, Berlin 1934; G. R. Rachmati, "Türkische Turfan-Texte VII", *APAW*, Berlin 1936; A. von Gabain, "Türkische Turfantexte VIII", *APAW*, Nr. 7, Berlin 1954; A. von Gabain & W. Winter, "Türkische Turfantexte IX. Ein Hymnus an den Vater Mani auf 'Tocharisch' B alttürkischer Übersetzung", *SBAW*, Nr. 2, 1958; A. von Gabain & T. Kowalski, "Türkische Turfan-Texte. X. Das Avadāna des Dämons Ātavaka", *APAW*, Nr. 1, Berlin 1959.

③ A. von Gabain, *Maitrisimüt I-II: Faksimile der alttürkischen Version eines Werkes der buddhistischen Vaibhāsika-Schule*, Wiesbaden 1957; Berlin 1961.

④ G. Hazai & P. Zieme, *Fragmente der uigurschen Version des "Jin' gangjing mit den Gāthās des Meister Fu"* (BTT I), Berlin 1971.

⑤ K. Röhrborn, *Eine uigurische Totenmesse* (BTT II), Berlin 1971.

⑥ S. Tezcan, *Das uigurische Insadi-Sūtra* (BTT III), Berlin 1974.

⑦ P. Zieme, *Manichäisch-türkische Texte* (BTT V), Berlin 1975.

⑧ G. Kara & P. Zieme, *Fragmente tantrischer Werke in Uigurischer Übersetzung* (BTT VII), Berlin 1976.

⑨ G. Kara & P. Zieme, *Die uigurischen Übersetzungen des Guruyogas "Tiefer Weg" von Sa-skya Pandita und der Mañjuśrīnāmasaṅgī* (BTT VIII), Berlin 1977.

⑩ S. Tekin, *Maitrisimüt nom bitig. Die Uigurische Übersetzung eines Werkes der buddhistischen Vaibhasika-Schule I-II* (BTT IX), Berlin 1980.

⑪ P. Zieme, *Buddhistische Stabreimdichtungen der Uiguren* (BTT XIII), Berlin 1985.

⑫ P. Zieme, *Altun Yaruq Sudur. Vorworte und das erste Buch. Edition und Übersetzung der alttürkischen Version des Goldglanzsūtra (Suvarṇaprabhāsottamasūtra)* (BTT XVIII), Turnhout 1996.

经》<sup>①</sup>、《回鹘佛教中的术数文献》<sup>②</sup>，维尔金斯 (J. Wilkens) 《佛的“三身”：金光明经卷三回鹘文本》<sup>③</sup> 等，其中以茨默教授的贡献最大。

另一个是《德国东方写本目录丛刊》(Verzeichnis der Orientalischen Handschriften in Deutschland)，其中的《古代突厥语写本》系列中，也包括一些整理德国国家图书馆所藏回鹘文残卷的目录，如第1卷是茅埃 (D. Maue) 的《柏林吐鲁番发现品中的梵文回鹘文双语文献》<sup>④</sup>，第2卷是埃尔斯 (G. Ehlers) 刊布的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和佛教譬喻故事类文献<sup>⑤</sup>，第5-7卷是拉施曼 (S. Raschmann) 编《柏林藏吐鲁番本回鹘文金光明经》<sup>⑥</sup>，第8卷是维尔金斯编《柏林吐鲁番收集品中的突厥语摩尼教文献》<sup>⑦</sup>，第9卷是同作者编《佛教忏悔文》<sup>⑧</sup>。

此外，山田信夫的《回鹘文契约文书集成》则是世俗契约类文书的总集<sup>⑨</sup>。

这些专著、目录以及大量散发的其他论著，为我们编纂回鹘文文书提供了指南，有些部分也可以说是编译，只是有些重要著作我们无法获得，只能有待来日了。

### (3) 藏文文书

吐鲁番出土的藏文文书不多，1980年由陶贝 (M. Taube) 整理出版了《柏林吐鲁番收集品中的藏文文献合集》<sup>⑩</sup>。我们据以编译成汉文。

### (4) 蒙文文书

德藏吐鲁番出土蒙文文献和文书，与上述吐鲁番出土回鹘文文献中的元代写本和印本关系密切。这些资料先由海尼士 (E. Haenisch 1880-1966)、福赫伯 (H. Franke)、卡拉等人先后从事整理工作。1993年，策仁苏德纳木 (D. Cerensodnom) 和陶贝合刊出《柏林吐鲁番藏品中的蒙古文献》，集中整理的全部蒙文文书<sup>⑪</sup>。我请党宝海博士据上述论著编译成蒙文文书部分的目录。

① P. Zieme, *Vimalakīrtinirdeśasūtra. Edition alttürkischer Übersetzungen nach Handschriftfragmenten von Berlin und Kyoto* (BTT XX), Turnhout 2000.

② P. Zieme, *Magische Texte des uigurischen Buddhismus* (BTT XXIII), Brepols 2005.

③ J. Wilkens, *Die drei Körper des Buddha (trikāya)* (BTT XXI), Turnhout, 2000.

④ D. Maue, *Altürkische Handschriften, 1. Dokumente in Brahmi und Tibetischer Schrift*, Stuttgart 1996.

⑤ G. Ehlers, *Altürkische Handschriften, 2. Das Goldglanzsutra und buddhistische Legendenzyklus Das akarmapathāvadānamālā Depositum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Stuttgart 1987.

⑥ S. Raschmann, *Altürkische Handschriften, 5-7. Berliner Fragmente des Goldglanz-Sutras*, Stuttgart, 2000-2005.

⑦ J. Wilkens, *Altürkische Handschriften, 8. Manichäisch-Türkische Texte der Berliner Turfansammlung*, Stuttgart 2000.

⑧ J. Wilkens, *Altürkische Handschriften, 9. Buddhistische Beichttexte*, Stuttgart, 2003.

⑨ 山田信夫著，小田寿典、ペーター・ツイーメ、梅村坦、森安孝夫编《ウイグル文契约文书集成》，大阪大学出版会，1993年。

⑩ M. Taube, *Die Tibetica der Berliner Turfansammlung* (BTT X), Berlin 1980.

⑪ D. Cerensodnom & M. Taube, *Die Mongolica der Berliner Turfansammlung* (BTT XVI), Berlin: Akademie Verlag 1993.

## 2. 英国图书馆 (The British Library)

斯坦因 (A. Stein 1862-1943) 在其第三次中亚探险过程中, 发掘了阿斯塔那 (Astana) 古墓, 揭取柏孜克里克石窟壁画, 在吐峪沟等处也有许多收获, 其中既有典籍, 也有文书。他的考古报告《亚洲腹地考古记》对于出土文书的来历有详细的记录<sup>①</sup>。

斯坦因对于所得每一件文书都给以原始的编号, Ast. = 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 Bez. = 柏孜克里克石窟, Ha. = 大阿萨遗址, H. B. = 小阿萨遗址, Kao. = 高昌故城, M. B. = 木头沟遗址, Tallik-Bulak = 吐鲁番西南部 Tallik-Bulak 遗址 (?), Toy. = 吐峪沟石窟寺, Yar. = 交河古城 (雅尔湖), Y. k. = 交河古城, Yut. = 鄯善丫头沟遗址, 等等, 有的后面跟有大小写拉丁数字, 表示某区遗址的某个房屋或洞窟, 最后的数字是具体文书的序号。

斯坦因三次中亚考察所获汉文、粟特文、突厥文、回鹘文等文书入藏英国图书馆后, 大体上是把第一次探险所得编到 Or. 8211 总号下, 第二次探险所得编到 Or. 8210 号下, 第三次探险所得编到 Or. 8212 号下。在将三次考察所获文献编号时, 似乎按照语言和出土地点大体上作过一些归类。Or. 8210 主要是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汉文写本和印本, 此后用缩写 S. (Stein number) 具体标示每一件文献。Or. 8210/S. 编号虽说著录的主要是斯坦因第二次考察所获敦煌文书, 但其中也混有一些斯坦因第一、第三次考察得自新疆和田和吐鲁番等地的文书。包括吐鲁番文书在内的斯坦因第三次探险所得文书, 都编入 Or. 8212/1-1946 号中, 由于斯坦因第三次探险的考察范围非常广, 因此这一部分的文书来历也非常复杂, 除吐鲁番文书外, 还有得自和田巴拉瓦斯特 (Balawaste)、达玛沟 (Domoko)、哈达里克 (Khadalik) 遗址、麻札塔格 (Mazar Tagh) 古堡, 楼兰古城及周边遗址, 敦煌藏经洞、长城烽燧, 内蒙古喀喇浩特 (Kara-khoto) 古城等处的文书, 这些非吐鲁番文献, 我们将其排除在外。

早期到英国考察敦煌文献的东西方学者较多, 对于英藏吐鲁番文献关注的不多。1953 年出版的马伯乐 (H. Maspero) 《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所获汉文文书》, 把其中较为完整的文献做了系统的整理, 并刊布了部分文书的图版<sup>②</sup>。日本学者在整理户籍<sup>③</sup>、法制文书<sup>④</sup>、契约<sup>⑤</sup>、题记<sup>⑥</sup>、道教典籍<sup>⑦</sup>、《法华经》<sup>⑧</sup> 等方面, 都尽可能地收罗了英藏吐鲁番

① A. Stein, *Innermost Asia*, Oxford 1928.

② H. Maspero, *Les documents chinois de la troisième expedition de Sir Aurel Stein en Asie Centrale*, London 1953.

③ 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 东京大学出版会, 1979年; T. Yamamoto & Y. Dohi. *Tun-huang and Turfan Documents concerning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II. Census Registers (A) (B), Tokyo 1985.

④ T. Yamamoto, O. Ikeda & Y. Okano. *Tun-huang and Turfan Documents Concerning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I. Legal Texts (A) (B), Tokyo 1978-1980.

⑤ T. Yamamoto & O. Ikeda. *Tun-huang and Turfan Documents Concerning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III. Contracts (A) (B), Tokyo 1987.

⑥ 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 1990年。

⑦ 大渊忍尔《敦煌道经目录编》, 东京福武书店, 1978年。

⑧ 兜木正亨《敦煌法华经目录》, 东京灵友会, 1978年。



文献资料。1989年，郭锋先生在英国期间，整理了马伯乐刊布以外的文书残片，出版《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所获甘肃新疆出土汉文文书——未经马斯伯乐刊布的部分》一书<sup>①</sup>。1990年，陈国灿教授利用日本东洋文库所藏图片，重新整理了这批文书，形成《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一书<sup>②</sup>。2005年8月，沙知、吴芳思（F. Wood）编著《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所获汉文文献（非佛经部分）》一书<sup>③</sup>，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全书图文对照，收录完备，印刷精美，可以看作是英藏吐鲁番文献的“决定版”。

英藏吐鲁番文书以汉文文献为主，我们的目录依据前人的刊本给出的名目，择善而从。大量的佛典残片由于没有公布图版，我们只能利用马伯乐和兜木正亨的著作给出部分的名称，其实如果这些残片公布，利用佛典的电子检索系统，比定这些残片的内容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至于非汉语文献，我们同样是利用前人的研究成果，其中包括数量不大的粟特文残片。

### 3. 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 of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 St. Petersburg Branch）

由于俄国版图与我国新疆毗邻，在中亚探险考察方面，俄国早就走在了西方列强的前面。与之同步，俄国驻新疆喀什、乌鲁木齐等地的外交官也早就开始收集中亚文物和文献。

1898~1918年间，俄国驻乌鲁木齐总领事克罗特科夫（N. N. Krotkov 1869-1919）陆续收集到一些回鹘文、梵文、吐火罗文、藏文、粟特文、叙利亚文残卷，他的收藏品大多应当来自吐鲁番。

1908年，俄国驻库尔勒领事吉雅科夫（A. A. Dyakov）收集到一批据说是吐鲁番阿斯塔那出土的文书，有回鹘文和汉文写本和印本。

1893~1895年，罗博罗夫斯基（V. I. Roroborovsky 1856—1914）和科兹洛夫（P. K. Kozlov 1863-1935）率领俄国皇家地理学会中亚考察队在新疆考察，获得四组回鹘文写本和一些波斯文写本。罗博罗夫斯基撰有《1893—1895年罗博罗夫斯基中亚考察初步报告》和《1893—1895年罗博罗夫斯基所率俄国皇家地理学会中亚考察队纪要》。

1898年，克列门兹（D. A. Klementz 1848—1914）率队考察吐鲁番的高昌故城，发掘阿斯塔那墓地，测绘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发现许多带有中亚婆罗迷文和回鹘文题记的壁画，还带回了几件梵文和回鹘文的印本佛典，与后来德国吐鲁番探险队所获相同，都是小乘佛典的早期刻本。克列门兹用德文撰写了此行的考察报告，题曰《1898年圣彼得堡俄国科学院吐鲁番考察报告》<sup>④</sup>。

1906~1907年，科卡诺夫斯基（A. I. Kokhanovsky）率队考察吐鲁番，共得到梵文、

① 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参看拙撰书评，《唐研究》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572-575页。

② 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参看拙撰书评，《唐研究》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575-577页。

③ 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8月。

④ D. A. Klementz, *Nachrichten über die von der Kaiserli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zu St. Petersburg in Jahre 1898 ausgerüstete Expedition nach Turfan*, St. Petersburg 1899.